

# 「我的1949」口述座談會紀實\*

鄭坤騰\*\*

## 壹、第一場座談會

### 一、與談人致詞（劉維開教授）

館長、口述人、在座的各位女士、先生：今天很榮幸奉命擔任這一場口述座談的與談人，剛剛館長在開幕詞提到關於1949，我想今天在座的除了參加口述的幾位先生、女士外，絕大多數人都是1949年之後才出生的，沒有經歷過1949年那個年代，所以這段歷史真的就是歷史。我自己正好進行1949相關問題的研究，而我會作1949的研究，應該與先父的經歷有關。先父是1949年初由北平出來，經過青島，後來到達臺灣，又再到海南島、香港，然後再從香港到臺灣，一路上經過很多事情，我曾經多次聽先父談起這些事，確實是他生命中十分特殊的一段經歷。先父15歲就離開家鄉山西，此後沒有再回去過，隨著工作單位到處奔波，前（2008）年過世，享年98歲，臺灣是他生活最長的一個地

方，住了將近60年，他生前曾經講過從來沒有想到會在一個地方待這麼長的時間。其實許多經歷過1949年的前輩，都有很多可以講述的故事，如果能將這些事情串起來，內容一定會遠遠超過《大江大海》。

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能跟兩位口述人對談，第一場對談人為張存武教授，張教授是我在唸研究所時的老師；另外一位是何祚明先生，何先生為在空軍服務的退役少校。等一下在講述的過程當中，先請兩位用20至25分鐘的時間作個人的陳述，包括籍貫、出生及1949年當時的身分；其次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來到臺灣、到臺灣來的過程、沿途印象深刻的所見所聞，另外剛到臺灣來的時候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印象為何？最後也請兩位分別陳述對於1949這樣的一個歷史有何感受。接下來就請張存武老師先就其個人經驗作一陳述。

\* 本文係中國近代史學會與本館在民國99（2010）年5月7日假本館臺北辦公室舉行之座談會紀錄。本次座談會與會人士包括本館林滿紅館長、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、輔仁大學歷史系林桶法教授、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存武教授、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森源教授、空軍退休少校何祚明先生、金防部TOC退休中校參謀長詹書俊先生以及鐵路局退休職員吳俊華女士。

\*\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



劉維開教授主持第一場座談會

劉樹斌攝

## 二、座談會實況

### 張存武教授（略）

### 劉維開教授

謝謝張存武教授。我們可以看到張老師的經歷，他是山東人，在抗戰期間參加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到了南方安徽。戰後到了杭州的嘉興青年中學，如果我印象沒錯的話，這所中學應該是蔣經國青年軍復員的嫡系學校，之後因為預備幹部局代理局長賈亦斌的關係，解散了中學。為求自身的發展，先到衡陽，再跟著部隊到廣州；到了廣州之後，又隨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一起南下。

國立長白師範學院的流亡經過，其實是非常值得去探討的。

我小時候的鄰居方永蒸先生，就是當時國立長白師範學院的院長，帶領師生從東北到海南島，再到臺灣。長白師範的學生和他非常好，我印象中他們每年都要聚會，方老先生十多年前過世，高齡一百多歲。張教授談到從流亡到海南島再到臺灣的日子，張教授跟著長白師範學院到海南島，之後又進趙琳的部隊，趙琳的部隊跟當時劉安祺的部隊中間又有些關係，之後到基隆，藉由收編的關係順利退伍，這樣的經歷真的是非



何祚明先生講述從南京逃難到重慶之經歷

劉樹斌攝

常精采，我想等一下如果還有時間的話，再請張老師來談一下其他問題，那我們現在就請何祚明先生來談一下他的1949。

### 何祚明先生

首先我想先感謝主辦單位讓我有這個機會報告有關我個人的經歷，在那個大時代的潮流中，我個人只是一個很小的水泡。我是民國19年，也就是1930年出生的。我出生的時候剛好就是國共戰爭的開始，所以我想起來覺得很有意思，我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生活在國共鬥爭的過程中，一直到現在。我出生的

時候是個很特殊的時間點，1930年是美國的經濟大恐慌，引起全世界的經濟危機，蔣總司令也剛剛開始剿共。日本人藉故引起事端。瀋陽事件的開始，就是日本人明地修建游泳池，其實暗地裡在修建一座炮臺，那時候日本人想擴展在東北的勢力，因此想製造一些爭端，希望可以名正言順的侵華，所以引起鐵路附近的一個爆炸，說是中國人故意破壞鐵路，試圖引起一個衝突。其實那個爆炸對於鐵路並未造成很大的損害。衝突起來後，那個炮臺後來修好了，就開始對張學良的部隊攻擊。所以那是引起中日戰爭的第一時間，再來就是盧溝橋

七七事變，所以那就是我出生時間的一個背景。

我的祖籍是安徽望江，出生地是上海，我為何出生在上海？是因為當時上海有很多租界區，所以也成立了一個公共租界臨時法院，我的大伯父擔任院長，法院有很多刑事化學的事務，需要一個人選，我父親從北大畢業後到美國史丹福大學受訓學成回來，正好適用，所以我就會在上海出生。當時國民黨正清黨剿共，上海的共黨地下組織也很活躍，很多地下活動分子。國民黨抓了二十幾個共黨分子送到臨時地方法院，其中有一個罪證確鑿便判刑，其餘沒證據的便沒判罪。上海有一個特別公安局，為國民黨勢力範圍的法務組織，要求將這二十幾個人送到那兒去，但是我伯父因為尊重司法獨立，未予理會。但後來中央發函限三日內將這些人押解到南京，我伯父還是沒答應，事情鬧大，無法再做下去，便離開上海。正好內政部要成立一個中央高級警官學校，為臺灣警校的前身。警校成立後，化學部需要人，我父親受聘，到南京上任，所以我小學是在南京唸書。離開上海後，我和母親曾回老家安徽望江一趟，望江是一個農村小鎮，古語說：「休越雷池一步」，「雷池」指的就是望江，它是在

長江還有雷水交會地帶，所以在古代也是兵家必爭之地。

我在南京唸小學時，抗日戰爭已很激烈，國軍敗得很慘。我唸幼稚園印象很深刻的，是對傷兵或敗退的士兵，那個慘狀很可憐，他們的服裝根本不像軍隊。後來有所謂的教導中隊，那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，駐紮在我們學校，準備到上海去增援。這個部隊跟我原先所見到的部隊完全不一樣，我非常崇拜那些士兵、官兵，覺得他們很有英雄氣概，後來他們幾乎都犧牲掉了，想起來真的是很難過。

上海失陷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，南京也很緊急了，政府機關急促地搬到重慶，警官學校也搬到重慶，父親跟著去重慶。母親則帶著我、姐姐和弟弟先回老家。離開南京之前，我們先住在南京馬群湯山附近，後面就是紫金山，那天晚上月亮非常奇特，月亮很亮，但周圍月暈一圈又一圈，呈同心圓狀態，那個景象很恐怖，當時風聲很緊，大家都很不安定，認為是不祥之兆。時局很亂，街上都是逃難的人，交通非常混亂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從下關搭火車，經過蕪湖回安慶時，看到南京附近的長江江邊，到處都是人山人海，每個人都在等船或車，準備逃難。我擠不上車，母親便將

我從窗戶塞進去，我才得以上車。

南京大屠殺的時候，難民受到日本人的凌虐，死傷非常慘重，大家可以想像得到。我們回到老家，南京不久失守，從望江老家就可聽到大炮聲響，老家的人也是人心惶惶。母親覺得不能久留，她是一個很保守的婦人，一個人帶了三個小孩，坐雞公車（為一種推車，中間有個輪子，兩邊坐人保持平衡，兩邊有把手，一個人就在後面推著行走）到長江交會渡口。到了渡口，母親雇用一艘民間帆船逃到武漢，記得那家船公司是民生公司，再到重慶與父親會合。在搭木船逃難的過程中，木船在長江上面行駛，日本的飛機不斷轟炸，甚至他們的戰鬥機是低空飛在江面上，對著船隻掃射，因此許多船隻都中彈著火燃燒，小孩子很害怕，很多半沉半浮的屍體在江面上，母親便拿著洋傘遮住船艙口，眼不見為淨。對於日本人暴行的痛恨，簡直是無法形容的。

到了武漢就有大輪船，但輪船啟航時間比較晚，我們就住在碼頭附近的旅館內。國軍節節敗退，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，直接躺在街道上，我們的窗戶一打開，就有很多士兵伸手朝我們要東西吃，我的印象是軍人的下場怎麼會如此淒慘，比叫化子還不如。最後我們到

重慶，靠岸的地方是朝天門，階梯一節一節的，我們是從南方平原過去，精神體力都很差，上岸看到樓梯，好像看到天梯，當下真的有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的感覺。重慶在嘉陵江與長江會合的三角地帶，長江的對岸就是南岸，中央警官學校位在南岸，我們和父親會合，就在中央警官學校旁定居下來。

四川的語言對我們這些遠方來的人而言很難，很多都聽不懂，例如去買東西，他們常說：「殺過囉」，意思是「賣完了」，我們就聽不懂，後來才知道意思。還有一個他們的口頭語，說長江下游叫「下江」、「腳底下」，所以他們把我們這些從長江下游來的人，都叫「下江人」或「腳底下的人」，但沒有污蔑的意思。

1945年日本投降時，我正好進幼校，幼校是六年的教育，教育還未完成，1949年共產黨已在北平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們先遷成都，再轉到臺灣。時局已經很亂，比方說幣制，原先是法幣，後來沒有信用，改成金圓券，一直在變更，最後金融體系也失去控制。

學校那時的補給很差，南京、廣州、重慶後來都失陷，我們就準備遷到臺灣。我很幸運是因為在空軍服務，所

以是搭空軍的飛機來臺灣，一個區隊一架飛來臺灣，在重慶及廣州各停留一天。有一件事可以表示當時的金融狀況，我在重慶買水蜜桃，老闆找錢是將鈔票用稻草捲起來，堆得很高，可以想像當時金融有多混亂。我很幸運的是直接搭乘飛機落地臺灣，所以沒有經歷太多逃難過程，對臺灣的印象是非常新鮮。來臺初期，美國總統杜魯門雖然承認臺灣的政權，但也明言不介入臺海之間的紛爭，真可謂是風雨飄搖，移民潮風氣很盛，那是最糟糕的時期。半年後韓戰爆發，美方驚覺判斷錯誤，宣布臺灣海峽中立，並派遣第七艦隊來臺，臺灣總算才穩定下來。

### 劉維開教授

謝謝何祚明先生精采的報告，何先生不只談到1949，反而更多在陳述1937年他的逃難經驗，我想在上一代的長輩，逃難經驗是相當豐富的。何先生是安徽人，在上海出生，隨父親到南京工作，之後又再回老家，後來又到重慶，在抗戰勝利那年進到幼校，這是一個人生過程，相當刻骨銘心的經驗。從何先生的陳述中，對於抗戰期間的逃難過程，包括時間、地點都記得十分清楚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主辦單位表示最後會留下時間讓大家來提問，或者發表個人

的看法。在這之前應該還有一些時間，就兩個問題請教，先請教張老師。剛才在張老師陳述的過程中，提到救國團，後來到臺灣也有救國團，所以想請教一下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關聯性？您也提到曾在趙琳的三十二軍待過，您可能看過劉安祺的口述歷史，是近史所訪問的，劉安祺在口述歷史裡面對趙琳有些批評，我不曉得當時您在海南島瞭不瞭解相關的事情。1950年2月到臺灣的時候，是因為部隊縮編的關係，剛才在您跟何先生的談話中都提到韓戰，我們知道韓戰在這段時期的重要性，您是否可以講一下您離開部隊之後的發展？再請問張老師一件事情，從山東流亡過來的人很多，您覺得彼此間的經歷有什麼不一樣？

### 張存武教授

離開部隊以後，長白師範學院有一個辦事處，找了一個小學讓我們四個人住，住了很短的時間，後來就把這四個人掛到青年服務團，我就準備考大學，後來改編成行政專科學校。

我沒什麼大印象，因為是跟政府一起，到臺灣後在沙鹿做事，有些人會到新竹去看電影，我就是看書，不過我去新竹看過歌仔戲，布景很好，我在家鄉看過紹興戲。



張存武教授（右）講述跟隨長白師範學院流亡經過

劉樹斌攝

他們年紀比較小是直接就去上學，我們山東來的對文史比較有興趣，我當時高中還沒畢業，就帶著幾本書，我考師範大學，是備取第五名。但是備取就等於正取了，我地理很好，就唸史地系，山東唸歷史的多，因為歷史、地理可以自己唸書，但是理工科沒辦法。

#### 林滿紅館長

我們今天的訪談會發表在《國史館館訊》上，現在紀錄上是說張存武先生1949年出任杭州救國團排長？

#### 張存武教授

我們就是國防部青年團，和蔣經國先生後來主持的救國團是不一樣的。

#### 劉維開教授

張老師這段歷程是相當精采的，接下來想請教何祚明先生，您剛提到在重慶唸幼校。我們現在講到1949年，蔣中正先生從成都的官校離開，那時候在成都有幾個官校，還是只有一個陸軍軍官學校？另外我服役時是在空軍通信學校，通校裡面有不少從幼校出來的，請問您後來是不是直接從幼校進入官校？您到臺灣來，幼校畢業後的這段經歷，能稍微講一下嗎？

### 何祚明先生

幼校是在灌縣成立，就是現在所謂的都江堰，在成都附近不遠，1949年再從成都搬到臺灣。

成都只有一個陸軍軍官學校，空軍有空軍機械學校和空軍通信學校。幼校遷臺之前，我們先搬到成都的太平市，太平市原本是空軍的通信學校，因為灌縣比較偏僻，所以就暫時先搬到通校，然後再從成都太平市搬到臺灣。幼校學生很多在通校的，因為幼校畢業後，根據身體狀況判別，身體條件合格的，就到官校，不合乎飛行條件的就分到成都通校、機校（按：通校是空軍通信學校；機校是空軍機械學校）。官校畢業後就一直在部隊上服役，一直到我50歲的時候退下來。

我在1951年於臺灣東港大鵬灣的空軍幼校畢業，直接進入官校。我的專長是領航、轟炸，1955年官校畢業就到部隊，那時候還是見習官，正好趕上金廈炮戰時期。見習官在6個月之內完全沒有經驗，按規定是不能直接參與作戰。但是因為臨時調派關係，我們一畢業後就直接參加作戰，沒幾天就有同學犧牲，金廈炮戰中對共方重炮陣地執行轟炸任務的時候被高炮打下去。

我先在第八大隊，早期有美國的資源，美援斷了以後，我們就缺乏後勤維修條件，第八大隊就3架湊2架，2架湊1架，最後就剩兩組，靠那兩架飛機擔任我們空軍部分特種任務。當時中央情報局和中華民國政府協調讓我們去飛，我們就是穿著便服執勤，在泰緬邊境，接濟泰國緬甸邊境的游擊隊和支援當年印尼反抗軍的任務。

### 劉維開教授

我想何先生本身除了1949的經歷外，他在空軍服務的過程中應該還有許多事情可以講述，不過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可能無法作進一步的講述，接下來還有十分鐘的時間，在座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或是與兩位相關的經驗，請發表。

### 來賓

麻煩可以就黑貓中隊或黑蝙蝠中隊的定義，解釋一下？

### 何祚明先生

黑貓中隊或黑蝙蝠中隊其實是對外的一個代號，黑貓中隊是35中隊，黑蝙蝠中隊是34中隊。當時臺海兩邊戰爭，所以互相偵測彼此的軍情，同時美方也非常迫切需要他們的資料。黑貓中隊主要的任務是高空偵側，飛機在七萬呎以上，共產黨雖然備足火力，沒有先進的裝備，其



會場內座無虛席

劉樹斌攝

防空反制火力及空中戰機都無法在此高度形成攻擊的危害，所以早期的偵測如入無人之境；後期共產黨的飛彈等設備開始發展射高與電子偵測，威脅危害，損失就非常慘重，高空也無法進入，但是低空偵測，臺海之間一直在做，由美方提供設備，我方提供飛行員。

黑蝙蝠中隊由來是因為後期沿海防衛火力嚴密，根本無法進入，損失非常慘重，只有在夜間利用低空（地形關係，偵測不到）、黑夜（目視看不到），進入大陸繼續執行偵測任務，敵方地面炮火與空中攔截會造成致命傷害之外，自身的飛行航跡與高度變化也會隨著低空地形的變化而分秒改變，所以需要掌控精確的計算，才不至於失誤撞山，造成更大更多的危害。因為有如蝙蝠的飛行，靠自己的官能判斷，而有「黑蝙蝠中隊」之名。

### 劉維開教授

我們這場時間已經到了，今天非常感謝張存武教授、何祚明先生兩位精采的報告，他們的報告不僅是對1949作了一段精采的回顧，甚至1949之後及1949之前，也有相當多的陳述，這一場的口述座談會到此結束，謝謝大家！

## 貳、第二場座談會

### 一、與談人致詞（林桶法教授）

若要談1949年來臺的話，時間應該擴大為1945-1953年左右，不能只局限在1949年，如何祚明先生是在1950年來臺，從富國島來臺的詹書俊先生則是在1952、1953年來臺等。

1945-1949年左右，來臺的人大概都是有一些任務、或是一些理由，但到了1949年以後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：第一、以不同的身分逃難到臺灣，因為



林桶法教授主持第二場座談會

劉樹斌攝

每個人的經驗都不太一樣，如張存武教授與何祚明先生，一位是陸軍、一位是空軍，乘坐的交通工具也不太一樣，陸軍坐的是船，而空軍則是搭乘飛機；第二、婦女與一般軍隊的經驗不一樣，軍人與商人的經驗也不太一樣。

很高興國史館能舉辦這場1949口述座談，並且能找到這五位不同時期來到臺灣的與談人。我不像劉維開教授一樣，學經歷豐富，我只能做到以旁觀人的角色，請口述者口述1949年中比較重要的經過，以及當事人所看到的一些情況、所遭遇的問題與來臺後的印象等。所以我們大概分為兩個階段：第一、是

敘述來臺的經過；第二、是來臺初期，面對陌生環境下的印象。其中如詹書俊先生及從帕米爾高原來臺的吳俊華女士，二位的經歷比較不一樣；另外還有李森源教授是在學生時期來臺的，所以這三位不同經驗的人會帶給大家不一樣的1949。

第一階段，每位演講者有15-20分鐘左右的時間，第二階段，我們會談一些來臺時的情況。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詹書俊先生。

## 二、座談會實況

### 詹書俊先生



詹書俊先生（左）講述隨部隊撤退到富國島經過

劉樹斌攝

館長、教授、各位貴賓大家好，我是詹書俊，貴州省安龍縣人，貴州人說話土音比較重，請大家見諒。共產黨以抗日之名，擴大自己，國民黨與共產黨兵戎武力相向，雖然雙方都是為國家的復興著想，但在日本投降後，大官大貪，小官小貪，看在老百姓眼裡，心懷不平，所以「窮人翻身分田地」這口號鼓動了窮多富少的社會。不過幾年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，中國的江山改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所有。

大家光耀一陣子後，共產政權開始清算、鬥爭了。1951年，我家被評為

地主，為了安全，我到處躲躲藏藏。國民黨部隊在三大戰役敗退下來的殘兵敗將，到處流竄，過著極為狼狽的生活。當時，由國軍二七二師師長余啟佑將軍在貴州西南各縣組織「反共抗俄」游擊隊，地方熱血青年踴躍參加，有錢人也扛著自己的槍，跟著去打游擊。這一號稱二萬八千多人的游擊部隊，從貴州打到廣西，結果被共軍層層包圍，每天過著驚惶無援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撿到一份共黨的《人民日報》，看到國民黨黃杰將軍的部隊在越南逃竄，於是余啟佑將軍帶領我們奔

廣西、進雲南。沿途共軍一層一層的封鎖，我軍是一層一層的逃竄，人員、裝備一天天的減少，約有熬不過苦難的二千人留在廣西王配倫的駐地，希望等時局安定後再回家，但聽說後來全被共軍所殲滅。到了雲南的文山、硯山，中了共軍的「口袋戰術」，幸虧在余啟佑將軍與張亞龍參謀長的指揮下，免於全軍覆沒。

傷病的沒有藥醫，命大的人活了下來，便把捱不過的人的槍彈收回來。進入中越交界麻栗坡的原始森林，正逢5月豪雨不斷，大家淋著雨、拿著刀子開路，日夜不停，累了就站著打瞌睡，好幾天沒有飯吃，怎麼活下去的，我也記不太清楚了。

進入北越後便設法聯絡法軍，但法國人只掌控一些據點，大多由胡志明的部隊所操控。途中越共追著我們，法國的飛機以為我們是共軍也追著我們，幸好我們其中有人帶著國旗，法軍見到我們搖著國旗，便停止攻擊回航了。據被抓到的越俘翻譯說：越過富良江（即紅河）就可聯絡法軍。那時正逢5月雨季，河水湍急，沒有可渡河的船隻，我們只能自己製作竹筏，用竹竿支撐渡船到對岸。

這是最後、最慘也是最悲傷的一

仗。在渡河的過程中，共軍在左後方追擊，越共在右後方攻擊，對岸的法越聯軍以為我們是越共也朝我們攻擊，直到看到我們高舉的國旗才停止，害我們冤死了許多人。這時，領導我們的余啟佑將軍與張亞龍參謀長一起乘筏渡江，不幸被隔山打來的炮彈擊中，余啟佑將軍中彈被洪流沖走，張亞龍參謀長則游到對岸。運氣不好的人中彈後被河水沖走，在岸上的人卻沒有辦法營救，最後我們只剩下一千六百多人。

過了江，光著腳走了百里的路，總算是聯絡上法軍，按照國際公法，繳交了我們的槍枝武器，除了傷病的人外，其餘的一千多人跟著法越聯軍，走到山羅機場，由飛機分批空運至河內，再搭火車到海防，最後由船把我們載到富國島，投入黃杰將軍的聯勤45縱隊，現更名為「苗越國軍管訓總處」。

在富國島渡過了兩年的時間，1953年政府派軍艦將我們接回臺灣。到了臺灣，參加了國軍炮兵部隊。1961年，我升上少尉，當時屬重炮部隊，在金門、馬祖、澎湖前線等地作戰了十二年半，參與過各種與共軍交戰的金門炮戰。直到1974年，我以金防部TOC中校參謀銜退伍為預備役。在臺灣娶了一位客家姑

娘為妻，但至今客家話、閩南話仍不太會說，一直保留著我貴州家鄉的口音。

今年我已84歲了，我的祖父被日軍槍殺，父親因內戰而死於異鄉。我們都是家破人亡的人，這條命是用來傳宗接代的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希望我們的後代子孫千萬不要忘記中英鴉片戰爭割香港、甲午戰爭割臺灣、中法戰爭讓越南、八年抗戰死傷一千萬人等這些血的教訓與恥辱。這是我的期望也是我的祝福，謝謝各位。

#### 林桶法教授

謝謝詹書俊先生這段感性的演說，詳述當年隨著部隊撤退到富國島流亡的經過。國史館編了一套《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》叢書，記載了相關的檔案與資料，意義重大。富國島這一批流亡的軍隊所經歷的事情，比其他來臺的部隊更為艱辛，詹書俊先生說到後來有些激動，但我們能理解那大時代的悲劇，他們的親身經驗給予我們後代史學工作者許多啟發。

吳俊華女士來臺的情況也非常特別，像我們研究1949大遷徙的情況大多是從上海、廣州、重慶、青島等地來臺，但吳俊華女士卻是越過帕米爾高原，輾轉來到臺灣，所以她的這段經歷

也非常特別。現在，我們把時間交給吳俊華女士，謝謝。

#### 吳俊華女士

館長、各位前輩大家好，我是吳俊華，北平人。1948年，我21歲，經朋友介紹認識了我先生。結婚一年後，遇到戰爭，那時共軍已經越過長江，天津也已經淪陷了，北平則由傅作義將軍守著，說要與共軍談和，我們待在北平等待談判的結果，但最後傅作義將軍也投降了，我們便搭火車離開北平。

當火車經過張家口時，有一段鐵路被共軍炸毀了，我們便改坐牛車，走了6天的路才到大同。那時天氣冷又凍的要命，非常辛苦，但因年紀輕，覺得像是在旅行一樣，並不覺得苦。到了蘭州，我們改坐十輪的大卡車，車上放著我們的行李，而我們就坐在行李上，那時我們大概有4、50人，全都是分批逃難出來的，到了蘭州便湊在一起。

由蘭州出發抵達新疆，被副縣長楊淑英攔下來，認為我們不像是逃難的人，把大家關了一天。之後，接觸到新疆當地的馬伕，因我們這一團人數夠多，便接洽安排我們爬山越過帕米爾高原，並準備旅途中所需的糧食。但那裡地方小，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我們



吳俊華女士（左）講述翻越帕米爾高原的經歷

劉樹斌攝

這麼多人，最後還是當地政府為我們準備「饜」，就像是一塊餅一樣，備足了一個月的份。

開始登山後，我們使用了各種交通工具，有時騎驢、騎馬或是駱駝，在最後一段山路時是騎馬，那段路陡峭且又是冰山，路面很滑，我們看到有被凍死的驢或馬，但我們不坐在馬上，是拉著馬尾巴往上爬，像這樣陡峭的山爬了很多座。

抵達巴基斯坦的邊界吉爾吉特後，我們便住在軍營裡，所有的人堆著棉被，就當作是自己的地方。住了一陣子後，當地有架小飛機，但只能乘坐6、7個人，

於是便分批載著我們到巴基斯坦的拉合爾，再搭火車到印度的加爾各答。在這，我真的要感謝駐印度大使館的大使羅家倫先生，他為我們安排了食衣住行，讓我們住在加爾各答唐人街的四邑會館裡，也為我們安排了一個食堂。

在加爾各答住了一陣子後，我們便搭乘一艘三萬多噸的英國薩丹納船，經過緬甸、新加坡。因為我們是難民，所以住在船艙的最下層，船上有電影院、網球場等，但我們沒有福氣享受。因船艙太大，不能直接到臺灣，便在香港轉乘永生輪到臺灣基隆港，那時已是1950年3月5日。因船上有許多政要，如國

大代表、立法委員、蘭州中央社社長唐雄先生、蘭州某報社總編輯關傑明先生等，他們都是有身分地位的人，大概有發電報聯繫中央，在我們下船時，看到當時的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歡迎我們。所以這一路很感謝我們的政府，由印度一直照顧我們，平平安安地抵達臺灣。

#### 林桶法教授

非常感謝吳俊華女士，她的這段經歷非常特別，以往逃亡的路線大多是由北方往西南或東南方向走，但吳俊華女士卻是走大同、蘭州的方向，這段經歷在1949年的個案中，屬於少數。雖然大部分來臺的經歷不盡相同，但大多是從廣州、上海出來的人較多，我想這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1949的複雜性。

接下來的李森源教授當年來臺時還是位學生，能夠來臺一定有不同的經歷。現在，我們把時間交給李森源教授。

#### 李森源教授

各位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，我原以為我是今天五位參加「口述1949」中年紀最大的，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大會把我安排在最後上場，和各位比起來，我算是年紀最小的，所以敬陪末座。我祖籍山東，但卻沒有回去過，因父親長年

在外經商，1932年我在南京出生。

1937年抗戰爆發，我們舉家沿長江逆流而上，經漢口到重慶，那時已是1938年了，便在當地一所小學入學。父親經過這兩、三年的逃難生活，長途跋涉，積勞成疾，加上醫療條件不佳，不幸在1939年過世，生活頓感困窘。後來，隨母寄居姑丈家。姑丈一生都在空軍服務。於是，便在當地空軍子弟小學讀書。

1945年，我在重慶白市驛的空小畢業。我家附近住有白市驛機場的空軍長官。8月中旬得知抗戰勝利的大好消息，大家都非常地高興。不久，姑丈服務的部隊復員到北平，於是我們便從重慶搭乘輪船、火車、汽車，一路經過宜昌、漢口。到了河南新鄉時，因平漢鐵路部分被共黨破壞，交通受阻，因而最後一段就改搭飛機。當天，正好是1946年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，那是我第一次來到故都北平。從飛機上看下去全是白色，在重慶、成都大後方讀了六年小學，還沒有親眼見過這種冰天雪地的北國風光，覺得很有趣。

在這兒，我也呼應何祚明先生剛才提到在重慶的那段艱苦歲月。日軍大舉轟炸重慶，政府為了讓大家提高警覺，



李森源教授講述國共內戰期間學潮與隨家人來臺經歷

劉樹斌攝

避免傷害，在市區各顯著地點放置一些高大的木製模型炸彈，及炸毀房屋、傷亡人體的畫像等，令人觸目驚心！大概是1941年吧？我讀小學三、四年級時，在一次日軍空襲中，重慶市區防空洞內因人多空氣不夠，發生悶死很多人的慘劇，極為悲痛！那回，我在家人帶領下，在眾人爭相推擠踐踏中，終於衝出防空洞大門，倖免於難。

1946年秋，我考進北平市立第六中學，位於皇城旁的南長街南口。在此住校讀了兩年多的初中，直到1948年底撤退來臺前夕止，仍未完成初中學業。故都文化水準很高，六中教學嚴格，雖未

能畢業，但基礎課業尚穩。在以後的求學過程中，確實有所助益。1948年夏，有很多東北來的流亡學生，他們在讀書和生活兩難的情況下，也給社會帶來一些困擾。那年的冬天，國共內戰吃緊，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帶動盪不安，我隨姑丈舉家遷移山東青島。先搭火車至天津，再自塘沽碼頭搭黃興輪至青島。沒想到局勢逆轉，隨即又轉往臺灣。黃興輪仍在青島停靠作業，軍方為我們軍眷們安排食宿。在大撤退中算是很幸運的了。所以，並沒有看到如龍應台女士所寫的書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中描述的種種艱難和危險情況，算是幸運吧。

在青島碼頭上，看到許多堆積如山的物資，也有美國水手酒喝多了，找錯船的情形。在青島滄口機場停留約一星期後，仍搭黃興輪到上海的楊樹浦碼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上海人說話好像不太客氣，看我們穿著棉襖，有些鄉下土包子的模樣，去商店買東西，問我們是不是北方逃難來的，似有不屑之意。我心裡便想：和對日抗戰相比，這國共內戰對他們來說好像事不關己，沒有同仇敵愾的感覺，這場戰爭恐怕很難打下去了。離開上海後，直往基隆，這段海域旅程還算順利。

1948年12月中，在基隆碼頭下船後，看到香蕉很想吃，但另外一種水果，長相很特別的，後來才知道叫楊桃。在大陸北方未曾見過，覺得很新鮮。那年我16歲，在正常情況下，應是安穩求學時期，沒想到在倉皇下來到寶島，更沒想到匆匆過了六十多年。當時，正想看看基隆港，印證一下老師講的，基隆乃一天然良港，軍港和商港，……，此時，又得到通知搭乘火車要去屏東潮州了。

第二天，到了潮州，那裡有日人留下來的營房可住，這一路從大陸北方來到臺灣南部，一個多月來總算暫時安頓下來了。1949年元旦，報上刊有中央政

府的元旦文告和對國共內戰局勢的變化與分析等，我看不太懂，只知道大局不利。我和幾個北平同船來的同學在潮州戲院看電影，演的是洋片，但卻是用臺灣話旁白，只記得是西部武打片，沒有中文字幕，看完了也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。經過潮州中學大門，進去看看，校舍很漂亮，還看到一所瘧疾防疫中心，沒想到潮州這不算太大的小城，建設卻很完善。當地人民樸實，有秩序，地方乾淨。2月中，我考進臺南二中繼續唸初三。校舍建築宏偉，教室內設備齊全，課桌椅整齊堅固，廁所也較衛生清潔，還有游泳池。在硬體設施方面，比起我在北平唸的學校算是完善多了。

1949年春季，在臺南二中求學時，可能是光復不久，國語推行尚未普遍，朝會升旗後，學校報告有關事項時，先用國語再用臺語。當時還遇見許倬雲先生，他是高三的大學長，後來的歷史大師。同年夏天，我家已自潮州搬到嘉義，就近考取省立嘉義中學高中部，1952年畢業後，進成大電機系。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就到臺灣電力公司工作，直到退休。退休後在世新大學兼課迄今。

1946-1948年離開北平前，因為是學生身分，所以，感受最深的是和學生有

關的學潮，有一個是「反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聯合國發表有損我國權益」的學生活動，我們中學生跟著大學生去參加抗議遊行，完全是愛國行為。後來還有抗議政府措施不當的遊行活動，但記不清楚是為什麼了。有一次遊行過後，看到用黑墨水在北平市議會大門上寫着「北平市土豪劣紳會」的字樣；另外還有一個學潮是抗議美軍強暴女大學生的，但也不清楚是否是北大學生（編者按：沈崇事件）。只記得那洋人好像名叫皮爾遜，那次事件轟動全城，也造成社會的不安，事後聽說有中共學生介入。

最嚴重的一次學潮，記得是發生在1948年的夏天。那時東北撤退，流亡到北平的學生生活困難，也沒有書可唸，可能是請願未遂引起騷動，不知為何有治安人員開了槍，於是問題就嚴重了。那時正逢暑假返校，碰到遊行隊伍經過，是聯合北平市十三院校為「反饑餓、反內戰」的大遊行。在路邊有人給我一張傳單，是印在一張粗糙紙張上的木刻板畫，畫裡是一個瘦高的男學生，一手拿著破碗，一手拿著書本，上面寫著「沒飯吃、沒書唸的學生，在光天化日下被政府槍殺了」。緊接著暑假過後學校開學了，國軍在華北軍事失利。各地時有學潮出現。記得還有一次是老師

因領不到薪水而發動罷課，學校停課一、二天。眼看局勢不穩，人心也恐慌起來了。

在這些學潮中，已有中共參與或策動。也有些老師、學生因時局不穩，加上一些官員貪腐，物價高漲，生活困苦等原因，而傾向同情共產黨。1948年底，北平市內，已有因爭購糧食而發生衝突的事件，可見當時局勢之嚴重。我家住北平南苑，開學後仍住校上課，但感覺時局日趨惡化。大概是1948年的11月22日，家人來校通知，即刻離校南遷。於是便匆忙地拿了一張轉學證明，隨家人一路輾轉來到臺灣。

### 林桶法教授

謝謝李森源教授為我們敘述當年千里來臺的經過，李森源教授的遷移史在1949的個案中，是比較幸福的，所以在李森源教授的臉上，只看到歲月，沒看到滄桑。很多人以為1949遷移的過程很混亂，沒有秩序，其實我們學者在做研究的時候都知道，1949大撤退是有計畫的，只是每個單位、個案、人物不盡相同罷了。

待會我們要請教李森源教授幾個較深入的問題，如買票、坐船來臺的情況等。接下來要請問吳俊華女士，為何當

年來臺會選擇西北而非西南或東南方向的路線？來臺初期，對臺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？若遇到語言不通的情形時，該怎麼辦？當年您從巴基斯坦、印度輾轉來臺，這些旅費是由個人、政府單位或是帕米爾齧雪同志會所籌措的？

#### 吳俊華女士

我和先生與同學們逃到蘭州後，本來預備前往西安，再由西安前往重慶，但西安已經被共產黨佔領了，所以決定由新疆南部走帕米爾高原來到臺灣。

剛到臺灣時，經朋友介紹，很幸運地可以到鐵路局工作，工作了四十年，直到1990年退休。那時鐵路局的同事大多是客家人，閩南人較少，他們對外省人很尊敬，並沒有欺負我們，這點我非常感謝他們。當時的我差不多23、4歲，年紀輕較不懂事，若有聽不懂的地方就唬弄過去，只要把分配給我的工作做好，不懂的地方他們都會教我，他們對我的態度與協助都很好。

1950年4月我們成立「帕米爾齧雪同志會」，來臺的旅費是由自己籌措的。越過帕米爾高原到巴基斯坦後，我們身上還帶著「饘」，所以糧食不至於匱乏。到了印度，因為難民的身分讓我們吃飯不用花錢。非常感謝主。

#### 林桶法教授

謝謝吳俊華女士。接下來要請教詹書俊先生，因為詹先生較晚抵達臺灣，那麼對臺灣的印象如何？

#### 詹書俊先生

當年在中國時，老人家說只是改朝換代，沒有關係，但我認為卻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於是我拚命地來到臺灣。到了臺灣後，看到當地的老百姓很窮困，他們對軍人的印象也不好，因為發生了二二八事件，這場悲劇到現在臺灣人民還是耿耿於懷。

我們後來住在彰化，有時會送些東西給臺灣人，有什麼事情也會幫他們忙，他們才對阿兵哥的印象改觀。有一次，我到了一間商店，老闆卻對著我說：「你們外省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。」但我卻說：「你們臺灣人沒有一個是壞東西」，我會說這句話是以防發生衝突。

從大陸撤退來到臺灣，有好處也有壞處，這些就交給學者們去評斷。我的太太是客家人，我們在臺灣的家族已到了第四代，我的祖先是隨軍隊討伐匪亂而落腳於貴州，貴州人稱我們是「苗子」，把我們當外地人看；到了臺灣

後，臺灣人又把我們當外省人看，所以命運真的很奇妙。我的父母親教導我不能去欺負他人，不能當壞人，到現在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，在服役期間也沒有私用過任何公帑。

### 林桶法教授

謝謝詹書俊先生的補充。接下來我們要請教李森源教授，為何當初搭乘黃興號沒有直接從青島來到臺灣，反而先到了上海？來臺的旅費又是如何籌措的？當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麼？

### 李森源教授

黃興號是招商局的輪船，自塘沽經青島、上海而基隆。我們是軍眷身分，搭乘此輪，是部隊奉命移防而行，所問旅費部分，應是由軍方安排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北平讀書的時候，可能是學生的關係，覺得學潮較多，影響上課學習。那時中共已介入學運活動，策劃領導及文宣工作都有其特色。很多青年學生日漸同情共產黨，形成很大的影響力。相對而言，政府方面似較被動。學潮鬧得緊的時候（大約是1948年秋後），有一次，我經過本校高中部的一間教室，看到黑板上寫著「高度學潮面面觀」，連作文題目都在討論有關學潮問題，可見其影響力之大了。

### 林桶法教授

我們非常感謝這三位先生、女士，在第一階段的演講中，大家能夠親自聆聽他們在1949年來臺的經過，非常幸運。接下來的時間，我們開放給與會的學者，或是有1949年來臺經驗的朋友，請提出問題或經驗分享。

### 李映女士

大家好，我是「帕米爾鬻雪同志會」的第二代。聽到吳俊華阿姨敘述從帕米爾高原輾轉來臺的過程，讓我更加瞭解父親當年來臺的細節。

儘管每個人所遭遇的情況不同，但根據父親的口述，當年父親在新疆當兵，軍隊公告戒嚴，不可擅自離開營區，但我父親仍帶著幾位同事及其家人，開著運輸部隊的車子離開。為了離開軍營，他們脫下軍裝改換平日的服裝，但車子卻遭到清查，所以有一部分的同事又被送回了部隊，但父親卻很幸運地離開了軍營。

在這，我要補充的是那時帕米爾高原上都是冰山，沒有樹木，只有滿地的白雪，「鬻雪」的意思就是喝雪水，這也是「帕米爾鬻雪同志會」名稱的由來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時候，謝謝。



林滿紅館長摘記座談來賓之經歷

劉樹斌攝

### 林桶法教授

我想國史館的工作人員若願意幫忙留下李映小姐父親的資料，或李映小姐願意提供這些資料給國史館，或許將來可以刊登在館訊上，是第二代子女為父親的留存與紀念。

### 林滿紅館長

這個機會非常難得，國史館屬國家單位，保存史料的條件要比私人機關好。有關「帕米爾鬻雪同志會」的照片、出版品，若能複製一份或將正本留在館內，我們都非常歡迎。

國史館的刊物《國史館館訊》隨時接受大家的口述資料，若還有其他同志會的成員，也歡迎介紹給我們，讓我們可以安排時間，逐步與他們訪談。國史館部分遷移到臺北館區後，成立一個總統、副總統的文物館，在展場中有一間「全民留史」的房間，可以留下國史的各方人士，都歡迎到我們這邊來，可以錄影或錄音，這些資料都會保存在我們的資料庫裡。

### 吳俊華女士

我還有一點想要補充。1950年2月

我們到臺灣後，在4月便成立了「帕米爾齧雪同志會」，由名譽會長于右任先生命名，他解釋說：漢朝時期，蘇武出使匈奴，結果被匈奴扣留在北海（今貝加爾湖）邊牧羊，因為沒有東西可吃，便吃毛羶，以表示他的貞潔與清白，最後蘇武終於回到他自己的家鄉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于右任先生要為我們取名為「齧雪」的原因。我們帕米爾齧雪同志會在內雙溪成立一間齧雪文物館及圖書館，是由李映小姐的父親李健春先生親手建造的。

#### 林滿紅館長

請問李映小姐的令尊還健在嗎？資料部分是否可繼續在原地保存下去？因為國史館有保存檔案、資料的地方。自從搬到臺北館區後，部分區域會規劃為常設展，在那會展出一些各國送給我們國家元首的禮物，我們會定期更換不同的展覽物品。四樓的空間我們規劃為特展，是針對各方人士長期贈送給本館的史料。現在，我們逐步在企劃一些專題，來展覽這些史料、故事，是否可考慮將那些珍貴的資料交給國史館，讓我們去做上述的經營？請多多考慮，謝謝。

#### 李映女士

家父已經過世了，其實父親最想蓋

的是一間大學，但後來卻花了十年的時間興建一間博物館，希望可以把當時來臺的資料保存下來，但博物館的那塊地屬於國家公園保護區，所以所有權有些爭議，目前有個公園被保留下來了，其他都歸還給陽明山管理處。目前我們還保存一些于右任先生的刻字，是于右任先生當年送給大家的一些字，父親把它摹刻在石頭上。父親在世時，部分資料都保存下來，如路線圖和一些著作等，但送至貴館保存這件事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，必須與理監事會討論再做安排。

#### 林滿紅館長

今天的座談會準備的並不周詳。國史館原本是在新店，今年4月才擴大至臺北館區，新店館區存放史料的資料室有二十四小時恆溫恆濕控制，保存資料的條件完備，因為我們不能在臺北這地價高的地方存放資料，未來會將資料存放在新店館區，臺北因為交通方便，所以便將這裡設計為展覽的地方。

由於帕米爾齧雪同志會已建立了博物館，有了這個基礎，現在我們正安排特展的時間，若你們的展覽文物完備的話，可以將資料交給我們國史館，以安排展覽的檔期。

#### 李映女士

陽明山上比較潮濕，沒有像國史館的空調設備可調節濕度，所以有些資料遭到損壞甚至是遭人偷竊，所以部分史料已遺失。

### 林桶法教授

謝謝館長、李映小姐與陳先生提供的意見與資源。接下來，詹書俊先生還有些話想要補充。

### 詹書俊先生

今年我已經84歲了，我的家庭在臺灣已經到了第四代了，我非常的喜歡臺灣，我把所有的財產都捐出去了，不管捐贈的金額多寡，都沒有寫上我的名

字，表示我真的很愛臺灣，謝謝。

### 林桶法教授

感謝館長安排今天這場活動，過去看到許多資料與檔案，今天則親自聽到貴賓分享他們的經驗。除了可以從檔案、資料獲得歷史資訊外，最重要的是人們的分享與傳承。我們感謝國史館做這樣的努力，可以把1949年的歷史分享給來臺一百三十萬軍民的第二代子女，讓他們瞭解當時父母親來臺的艱辛。今天的座談會就到此結束，謝謝各位的參與。



與會人士合影，右起詹書俊先生、林滿紅館長、吳俊華女士、李森源先生、張存武先生、林桶法先生。劉樹斌攝